

## 心學、理學、史學兼綜之《詩》本義探尋 ——王應麟《詩經》學試析

胡瀚平\*、閻耀棕\*\*

### 摘要

宋代經學風氣，多務於擺落漢唐舊說，學者一空依傍，習於間出己意，各肆其學思，疑經改經，蔚為風尚。揆諸《詩經》學，則除攻擊漢唐以外，又各有主張，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遂至於紛然聚訟。洎至宋末元初之王應麟（1223—1296），字深寧，其學兼綜朱熹、陸九淵、呂祖謙三家，《宋元學案》述其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是其先以呂學下達功夫為基礎，進而持朱學格物以辨證，而終達於陸學之致一，顯然據「下學而上達」為本而訂定其為學之序，此為學之序亦忠實地反映於其《詩經》學上。謹案王應麟《詩經》學專著現存者有《詩地理考》、《詩考》，又有《詩》論見於其《六經天文編》、《困學紀聞》，其於《詩》可謂戮力甚深。復王應麟年逾古稀，其學思歷程當必偕時晉篤，王應麟調和有宋以來諸學派之立場所界定之《詩》本義，及其所運用之調和方法，乃至於所開展《詩經》學之特色及時代意義，皆應為研究宋代《詩經》學者所值得關注之議題。本研究擬試就深寧所界定之《詩》本義，及其所運用之調和方法兩面向，析論深寧之《詩經》學，以求客觀呈現其《詩經》學之全貌。

**關鍵詞：**《詩經》、王應麟、三家詩、〈毛詩〉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講師。

到稿日期：2011 年 12 月 29 日；接受刊登：2012 年 2 月 10 日；最後修訂日期：2012 年 3 月 1 日。

## The Study on Wang Yinglin's *Shijing Study*

Han-ping Hu\* & Yao-zong Yan\*\*

### Abstract

The trend of academic study in the Song Dynasty mostly aimed to get rid of the cliché brought forth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cholars no longer sought to imitate the works of their predecessors, but to carry out their own theories, doubting and re-editing the classics. As for the studie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apart from attaching the theorie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each and every branch of study had its own argument. In the end, the theories were diverged and disaccorded.

Between the mid-1200s to the late-1200s A.D., Wang Yinglin (王應麟, 1223-1296) combined the arguments of Zhu Xi (朱熹, 1130-1200), Liu Jiuyuan (陸九淵, 1139-1193) and Lu Zuqian (呂祖謙, 1137-1181) in his studies. *Song-yuan Xue An* describes his studies as “a selected collection of arguments from multiple schools”. With the studies of Lu as bases, he advanced to Zhu’s studies to build up the method of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 and he finally reached the state of Liu. He had apparently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starting from the modest and progressing upward” in his process of academic pursuit. This principle is also shown in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Wang’s remaining works which specialized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include *Shi Di Li Kao* [literally meaning “a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y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Shi Kao* [literally meaning “a research on the *Classic of Poetry*”]. His studie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can also be found in *Liu Jin Tian Wen Bian* [or *Treaties on Astronomy in the Six Classics*] and *Kun Xue Ji Wen* [literally meaning “about the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These indicate that there were great efforts put into the related area.

Wang lived till an old age and his academic level has advanced with his age. He gathered and unified different theories defining the essence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Close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his method of unifi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Classic of Poetry* he established,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at study. This study aims to observe how Wang defined the essence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and his method of unification. By doing this, the researcher wishes to analyze how the *Classic of Poetry* and to see objectively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this area of study.

**Key words:** Wang Ying-lin , Shijing Study , Three School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Mao School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December 29, 2011; accepted February 10, 2012; last revised March 1, 2012.

## 一、前言

有宋一代，經學發展幡然變古，多務求擺落漢唐，疑經改經，蔚為風尚。在《詩》則自歐陽修《詩本義》出，而啟尊〈序〉廢〈序〉之爭，至鄭樵《詩辨妄》後，爭端更趨熾烈。<sup>1</sup>然兩宋學者所以主張尊〈序〉廢〈序〉者，根本皆僅各肆其學思，以界定《詩》之本義而已，是以說《詩》大率自出己意，新義迭出。若政治家以《詩》乃聖人所取合於禮義者，又尊〈序〉以為先王之法言，藉以託古改制；<sup>2</sup>又若理學家以《詩》載天理，而〈序〉僅漢儒所作一家之言，多有不可勝言致未明理者，故於〈序〉多有取捨；<sup>3</sup>又若心學一派強調發明本心，以為「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sup>4</sup>則於《詩》甚或恣意刪改添字，於〈序〉更無所取；更有折衷理學、心學之間而董理文獻，力求微而有信者，以《詩》至兩宋惟傳〈毛傳〉、〈鄭箋〉，而〈序〉義多與經傳同，是以翳然宗〈序〉。<sup>5</sup>除此以外，濟濟多士參核字句，針砭〈毛〉、〈鄭〉，各舉異義，不勝枚舉。諸家各持己見，均自謂得《詩》本義，紛然聚訟，迨宋覆迄至於今，仍時有餘響。

降及南宋末葉，諸學派隱然有合流之勢，王應麟（1223—1296）生當宋末元初，《宋元學案》述其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兼賅朱熹（1130—1200）、呂祖謙（1137—1181）、陸九淵（1139—1193）三家，<sup>6</sup>謂「不名一師」是其學之廣大，可以廣納；

<sup>1</sup> 關於宋代《詩經》學者尊〈序〉廢〈序〉之爭，詳可參今人黃忠慎：《宋代《詩經》學探析——以歐陽修、蘇轍等六家為中心的考察》〔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9月〕一書第一章〈宋代《詩經》學著述解題〉，其據朱彝尊《經義考》所載目錄，詳考宋儒《詩經》學著作凡一百八十三冊，以鉤勒宋儒《詩經》學概況，證得尊〈序〉廢〈序〉之爭乃宋代《詩經》學重要課題。

<sup>2</sup> 謹案王安石就《尚書》、《詩》、《周官》作新義，合稱《三經新義》，藉以託古改制，行其新政，其中《尚書新義》、《詩經新義》已軼，然序皆猶在，其於《詩經新義·序》論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已成焉。」〔王安石著：《王安石全集》〔台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10月〕，卷25，頁148。〕是安石亟言《詩》之可以為典制，而欲藉其以改制。

<sup>3</sup> 謹案《朱子語類·詩一》載朱熹曰：「〈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宋〕朱熹著：《朱子全書·拾肆》〔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合編，2002年12月〕，頁2736。〕又載朱熹曰：「《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朱子全書·拾肆》，頁2742。〕顯見朱熹以〈序〉為漢儒所作，故內容間有不能合於《詩》本義者。此外又載朱熹論讀《詩》法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朱子全書·拾肆》，頁2756。〕又可見其《詩經》學以義理、天理為第一義諦之理學家觀點。

<sup>4</sup> 〔宋〕陸九淵著、傅子雲編次，〔明〕傅文兆校閱：《象山先生全集》，收入《四庫存目叢書》〔台北：莊嚴文化，1997年6月〕，集部19，頁330。

<sup>5</sup> 謹案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於〈關雎〉後作案語：「〈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真也。間有反復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也。」〔〔宋〕呂祖謙撰：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6月〕，總73，經部67，頁342。〕是呂祖謙之舉四家《詩》義與經傳相較，以證〈序〉義多與經傳合。

<sup>6</sup> 謹案全祖望於《宋元學案》述深寧之學：「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游，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明〕黃宗羲撰、〔清〕全祖望續修、〔清〕王梓材校補：《宋元學案》〔台北：河洛出版社，1976年3月〕，卷85，頁2。〕是以深寧之學兼賅

「和齊斟酌」是其學之精微，可以調和，廣大精微兼而有之，是以深寧之學當為有宋一代殿軍。考深寧《詩經》學專著現存者有《詩地理考》、《詩考》，又有《詩》論見於其《六經天文編》、《困學紀聞》，其於《詩》可謂戮力甚深，則深寧調和有宋以來諸學派之立場所界定之《詩》本義，及其所運用之調和方法，乃至於所開展《詩經》學之特色及時代意義，皆應為研究宋代《詩經》學者所值得關注之議題。本研究擬試就深寧所界定之《詩》本義，及其所運用之調和方法兩面向，析論深寧之《詩經》學，以求客觀呈現深寧《詩經》學之全貌。

## 二、 心學、理學、史學之兼綜

論者雖以深寧為兼治朱、呂、陸之學者，然朱、陸兩派對本體乃至功夫的看法殊異，朱學倡「性即理」，故首言「道問學」強調勤學之功夫；陸學以「心即理」，故首倡「尊德性」強調本心之發明，兩派歷呂東萊促成鵝湖之會論學，依舊相持不下，又學者多以東萊學兼朱、陸，素以總羅文獻聞名，較之朱、陸之重本體之上達，似更著眼於下學功夫，其功夫進路似乎又迥異於朱、陸，則深寧如何調和朱、陸，進而兼賅東萊以及兩宋以來諸家，以開展其《詩經》學？全祖望於《宋元學案》中述深寧之學，以為「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以深寧為四明學者，強調其陸學背景，而於其朱學、呂學僅曰：「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sup>7</sup>顯然認為深寧所以兼賅三家，乃以陸學為本，朱學、呂學為輔。而早在全祖望前，黃百家於《宋元學案》論深寧之學思歷程曰：

百家謹案：清江貝瓊言：「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于正，無陸氏偏駁之弊。然則，四明之學以朱而變陸者，同時凡三人矣：史果齋也，黃東發也，王伯厚也。」<sup>8</sup>

此以深寧為「四明之學以朱而變陸者」，又述深寧「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使一時學者「粹然皆出于正，無陸氏偏駁之弊」。顯然黃百家亦以深寧之學大本在於陸學，而又輔以朱學矯陸學「偏駁」之弊，然於此未論何以陸學「偏駁」，更未論其如何以朱學矯陸學之「偏駁」。總觀《宋元學案》屢見學者論陸學「偏駁」之處，乃以陸學專於「先立其大」，則其學過於直截，又專於內求而少資於外，恐流於主觀臆斷之弊，<sup>9</sup>故雖可自以為本心已然發明，而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sup>10</sup>然若此心不能復合於外在現象界，甚至刪經改經，強將六經偽作己之註腳，則不能證本心已然

朱熹、陸九淵、呂祖謙三家。

<sup>7</sup> 本段全祖望之論述，可參見於本文註六。

<sup>8</sup> 《宋元學案》，卷 85，頁 3—4。

<sup>9</sup> 謹案《宋元學案·序錄》論象山之學：「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明〕黃宗羲撰、〔清〕全祖望續修、〔清〕王梓材校補：《宋元學案》〔台北：河洛出版社，1976 年 3 月〕，卷 1，頁 11。〕又《宋元學案·劉李諸儒學案》載：「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宋元學案》，卷 30，頁 39。〕

<sup>10</sup> 《象山先生全集》，頁 320。

發明，宇宙仍是宇宙，吾心仍是吾心，一切皆是私臆空言，是謂偽學。<sup>11</sup>是以黃百家所謂深寧以陸學為大本，輔以朱學以矯陸氏「偏駁」之弊，或乃不廢陸學所謂「先立其大」之本心，又援朱學「道問學」、「格物致知」之功夫，藉格現象界萬物之理以參證之，<sup>12</sup>若能客觀證得內在本心與外在現象界相合，則宇宙方是吾心，吾心方是宇宙，當可以謂本心已然發明，非是私臆空言，亦不需刪經改經，強將六經偽作己之註腳，六經自然是己之註腳。

若以朱學功夫參證陸學本心，是王應麟融通陸、朱之法，而論者以深寧兼朱、呂、陸三家，其中東萊似更著眼於下學功夫，則專由功夫論之，朱學之功夫如何與呂學之功夫交融？黃百家於《宋元學案》引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論曰：

厚齋著書之法，則在西山真為肖子矣。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王尚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真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為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sup>13</sup>

是黃百家以為深寧著書之法，兼得朱、呂二家，得之於東萊者，則為總羅文獻。謹案朱學所謂「格物」之「物」既包含現象界之萬有，則呂學所總羅之文獻，亦當屬現象界萬有，則呂學著書之法，應不悖於朱學格物之方，故深寧非僅當為西山尚子，亦是呂氏世嫡。然又謹案朱子之論文獻，以為六經與它書有別，不可以一概而論：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sup>14</sup>

在「格物」之「物」包含現象界萬有的前提下，朱子以三代以上經聖人手之六經全是粹然天理，三代以下之史、子、集等則得失交雜，故有心力當先讀六經，於天理

<sup>11</sup> 今人何澤恆亦就此現象批判曰：「惟陸王倡心即理，以為吾心即天理，不知聖人之心固無不中理，然必不得即謂凡人之心得合於理也。」〔何澤恆：《王應麟之經史學》〔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1981年〕，頁158。〕，此說則甚直指陸王之流治經弊病，陸王之流亟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卻無法就客觀現象界層面證明己心合於宇宙，而以凡為聖，以私臆為天理，謂己聖賢，甚者乃至楊簡之徒，以經義不合己意，無法自圓其說，而動輒刪改添字。

<sup>12</sup> 如《朱子語類·理氣上·太極天地》載朱熹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朱子全書·拾肆》，頁117—118。〕是以天地生萬物，萬物皆具天地之心，又《朱子語類·大學一·經上》載朱子曰：「而今且說格物這箇事理，當初甚處得來？如今如何安頓它逐一只是虛心去看萬物之理，看日用常行之理，看聖賢所言之理。」〔《朱子全書·拾肆》，頁440。〕則進一步以天生萬物皆具理，論格物之「物」應包含萬物，而所謂「日用常行」，即言客觀之現象界。

<sup>13</sup> 《宋元學案》，卷85，頁4。

<sup>14</sup> 《朱子全書·拾肆》，頁347。

有所把握，再讀三代以下書方可進一步辨其中成敗，而無論讀六經抑或子、史、集俱是格現象界萬有之物，是以曰「書那有不可讀者」。顯然朱熹以三代為界劃分文獻，三代以上之六經為粹然，三代以下文字均是瑕中有疵，故論讀書則先以掌握六經粹然天理為本，行有餘力，方及其餘雜類以辨得失為末。<sup>15</sup>若順此推致，則面對三代以下文字，必須以六經、天理為本而有所取捨，是以在《詩經》學，朱熹於漢唐以來諸舊說均條條斟酌、有取有捨，其於《詩序辨說·序》論其辨曰：

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之其得失云。<sup>16</sup>

〈大序〉、〈小序〉之說，乃至〈齊〉、〈魯〉、〈韓〉三家等均是三代以下非經之文字，於朱熹而言自然有瑕有疵，故考朱熹《詩序辨說》，於〈大序〉、〈小序〉逐條辨其得失，有取有捨。然〈大序〉、〈小序〉諸條雖有瑕有疵，仍得朱熹頗采以附〈傳〉中，其自云乃「以其所從來也遠」，或以較近於三代故，故或可謂朱熹以愈近於三代者，瑕愈勝疵；愈遠於三代者，疵愈勝瑕。復觀呂祖謙《呂氏家塾讀書記》，其總羅先秦至宋季以來史傳、諸子百家以說《詩》，其廣蒐文獻，務求徵詳，自為標舉三代六經之朱子所不許，然東萊所以廣蒐文獻，亦是先讀經，有其主張，方能附眾說於經句之間，則不可驟斷東萊滯於文獻而不明理，其廣蒐文獻，亦不出朱學格物之方，則專就著書之法論之，朱學、呂學不同處僅在選用文獻之態度，一講求古今先後次第，一則合於理者皆廣納之，論者以深寧兼朱、呂著書之法，或出於深寧不廢朱學格物之方，亦兼采呂學之博取。

總前人之評述，可推知深寧之兼陸、朱、呂三家，在於以呂學之博取，行朱學之格物，證陸學之本心。然由本體至於功夫，乃至治《詩》，深寧又如何自視其學？其於《困學紀聞·詩》徵引諸家，以考〈齊詩〉「四始五際」之說：

《詩緯·含神霧》曰：「集徵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災度》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危」，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sup>17</sup>

<sup>15</sup> 謹案《朱子語類·學五·讀書法下》載朱熹曰：「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筭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朱子全書·拾肆》，頁347。〕顯見朱熹以經為本為先之立場。

<sup>16</sup> 《朱子全書·壹》，頁353。

<sup>17</sup> 〔宋〕王應麟著、〔清〕何焯、閻若璩評註：《困學紀聞》，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

首先觀深寧所引文獻，首列《詩緯·含神霧》以《詩》為天地之心，謹案「天地之心」一詞出於〈彖·復〉，孔疏曰：「天地養萬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天地之心」，<sup>18</sup>此萬物共秉恆生之生化作用，亦同於〈繫辭上〉所述「生生之謂易」，<sup>19</sup>是以天地之心為本體，而此本體當範圍現象界君德、百福、萬物等一切萬有，其意亦同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其次觀深寧所引文獻名目，《詩》緯凡三、翼奉事出《漢書》、<sup>20</sup>郎顗事出《後漢書》，<sup>21</sup>總羅文獻，不侷於六經，是東萊著書之法；復次觀其內容，「四始五際」之說乃出於〈齊詩〉，將《詩》篇繫於五行十二支，以觀人事興廢盛衰，謹案《汎歷樞》以寅木始配卯木改正之際、巳火始配午火革命之際、申金始配酉金改正之際，唯亥水既為始又為革命之際，故深寧引翼奉、郎顗事以考之。謹案十二支順行，至亥而終，越亥至子而復；陰陽消長，至亥辟坤而純陰，越亥至子始生一陽。故亥所以同為始為際，乃既處將終、亦處將始，則將入亥之戌當為四始五際之要，是以深寧引翼奉所聞五際之要在〈十月之交〉補之，《詩》篇與五行相繫因之得全矣，而此序恆生循環，合於《周易》天地之心生生之義。陰陽五氣本是天地萬有，推致二氣五行之變，是朱學格物之方，繫以《詩》篇，輔之以《詩》緯、史傳，以明《詩》所載天地之心、生生之理，而《詩緯·含神霧》以〈彖·復〉「天地之心」與〈齊詩〉「四始五際」相提並論，意即在所秉天地之心、生生之理皆一故。顯然深寧此以呂學之廣納，行朱學之格物，證陸學之本心，則《詩》所載天地之心、生生之理雖為一本，但不可以別於外在客觀現象界之萬殊，故深寧又於《困學紀聞·詩》引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sup>22</sup>是深寧以為不僅《詩》所載之理可以遍通於現象界之萬事萬化，《易》所載之理亦可以遍通現象界之萬事萬化，則《易》、《詩》所載之理一，六經所載之理俱一，此理即陸象山所論：「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sup>23</sup>深寧更引而申之：「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sup>24</sup>深寧所界定之《詩》本義殆此理也。

據上所論，既明深寧兼綜史學、理學、心學所界定之《詩》本義，乃可以範圍天地、周遊六虛之理，則深寧又如何據此理開展其《詩經》學？此宜就其《詩經》學著作析論之，下即就其《詩經》學著作析論之。

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6月〕，總854，子部166，頁208。

<sup>18</sup>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65。

<sup>19</sup> 《周易正義》，頁149。

<sup>20</sup> 謹案《漢書·翼奉傳》載翼奉上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715。〕

<sup>21</sup> 謹案《後漢書·郎顗傳》載漢順帝時郎顗公車上書云：「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宋〕范曄撰、〔唐〕章懷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387。〕

<sup>22</sup> 《困學紀聞》，頁209。

<sup>23</sup> 《象山先生全集》，頁320。

<sup>24</sup> 《困學紀聞》，頁209。

### 三、格物致知乃至以意逆志

謹案深寧《詩經》學專著現存者有《詩地理考》、《詩考》，又有《詩》論見於其《六經天文編》、《困學紀聞》，深寧年逾古稀，其學思歷程當必偕時晉篤，則欲析論深寧之作，理當據於成書先後而疏理之。《困學紀聞》為深寧一生學力所萃，其作最晚，殆無疑矣，今人何澤恆氏又綜參版本、考核內文，以為《詩考》當作於深寧四十二歲，其作當在《周易鄭注》之先，為其輯佚最早著作，<sup>25</sup>是知《詩地理考》、《六經天文編》作於《詩考》、《困學紀聞》之間，故以下據成書先後，依次試析《詩考》、《詩地理考》、《六經天文編》、《困學紀聞》。

#### （一）《詩考》

《詩考》一書共五卷，卷一〈韓詩〉、卷二〈魯詩〉、卷三〈齊詩〉、卷四〈詩異字異義〉、卷五〈逸詩〉、卷六〈補遺〉，乃采集三家《詩》之遺說、《詩》之異軼之文，彙成一編。前文已論朱熹以六經為粹然，六經以外文字或多有疵，是以朱熹不滿學者治《詩》獨尊〈毛〉、〈鄭〉一家之言，其欲參三家遺說乃必然，復呂東萊之重文獻，其著力輯三家《詩》遺軼，較之朱熹更為尤甚，故觀《呂氏家塾讀書記》引三家《詩》處甚多，而朱熹於是書作序贊曰：「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sup>26</sup>復觀深寧《詩考·序》自論其著作要旨曰：

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sup>27</sup>

此深寧自謂推崇朱熹治《詩》，不固守〈毛〉、〈鄭〉，又兼參三家《詩》，而因之廣披典籍、搜羅軼文，以求三家《詩》說、及《詩》異軼之文，不僅補朱熹於三家《詩》之未竟，更是東萊總羅文獻之法。其采集三家《詩》之遺說、《詩》之異軼之文，於諸條目下俱標明出處，未間以己意評論諸家《詩》之優劣高低，如《詩考·魯詩》云：

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後漢書》注：「〈魯詩傳〉曰：『……』」

28

<sup>25</sup> 謹案今人何澤恆考證云：「然如《詩考》後序所述各條，緣何《紀聞》竟一一及之，則殊不可解。《詩考》一書，據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所錄元泰定刊本翁序，署『宋理宗景定五年甲子良月』，則當深寧之四十二歲，可謂其輯軼之最早著作，尚在《周易鄭注》之先。」〔《王應麟之經史學》，頁175。〕

<sup>26</sup> 《呂氏家塾讀詩記》，頁323。

<sup>27</sup> 〔宋〕王應麟著：《詩考》，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6月〕，總75，經部69，頁598。

<sup>28</sup> 《詩考》，頁612。



謹案「梁鄒」一辭未見於〈毛詩〉，此深寧於《文選注》、《後漢書》注兩處所輯〈魯詩傳〉遺說。又若《詩考·齊詩》「四國是匡」條：

四國是皇，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據。<sup>29</sup>

《詩·邶風·破斧》有「四國是皇」句，《毛傳》釋此句僅曰：「皇，匡也」，<sup>30</sup>《鄭箋》下則未釋何以「皇，匡也」，深寧則總羅文獻，據董氏與賈公彥，乃知「皇，匡也」出於《毛》、《齊》異文故，而未以己意評論何者方是。至於全書之末，方述四家《詩》之異同：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sup>31</sup>

深寧述《詩》四家異同，首先就四家所據《詩》版本述之，〈毛詩〉與〈韓詩〉之差異較為顯著，可見於《釋文》，而〈魯詩〉、〈齊詩〉與〈毛詩〉、〈韓詩〉彼此間的差異則難以考察，謹案《詩考·魯詩》、《詩考·齊詩》之篇幅尚不及《詩考·韓詩》之什一，難以考察之因，或以深寧所輯得〈魯詩〉、〈齊詩〉過少故。其次就四家說《詩》內容述之，則舉諸例而作「漢儒言《詩》，其說不一」之總結。總深寧以上所述兩現象，在四家所據《詩》版本異同無法完整考察的前提下，將「漢儒言《詩》，其說不一」歸因於所據《詩》版本異同，只是證據力不足的塗附，但若許慎近西漢之世，述四家《詩》說不同乃出於今古文之異，同樣在四家所據《詩》版本異同無法完整考察的前提下，亦不得斷其塗附，故於「漢儒言《詩》，其說不一」之現象亦只得存而不論而已，是以此「併綴而錄之」立場客觀，粹然總羅文獻以俟後學而已，合於其所自論「扶微學，廣異義」之旨。

## （二）《六經天文編》、《詩地理考》

《六經天文編》、《詩地理考》作於《詩考》之後，《困學紀聞》之前，《詩地理考》要在詳考《詩》中所述之地理現象，《六經天文編·詩》則在詳考《詩》中所述之天文現象。〈繫辭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sup>32</sup>〈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sup>33</sup>復《淮南子》於〈原道〉、〈俶真〉後緊接〈天文〉、〈地形〉，是皆以萬物之始於天地，因之皆以天地相提並論，又謹案窮究《詩》中所述天文地理之風氣始於漢代，觀今所傳《詩》緯內容皆不出於此範

<sup>29</sup> 《詩考》，頁 612。

<sup>30</sup>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616。

<sup>31</sup> 《詩考》，頁 632。

<sup>32</sup> 《周易正義》，頁 143。

<sup>33</sup> 《周易正義》，頁 187。

圍，而鄭玄更作〈詩譜〉以詳考之，則深寧於《詩考》總羅文獻、底定丕基之後，將持之以格天地萬物，明天地之心，故續作《六經天文編》、《詩地理考》，今本《六經天文編》未見深寧自序，謹案深寧於《詩地理考·序》論曰：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二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網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sup>34</sup>

二氣五行交變以成天地，天時流轉，地生萬物，人有殊方，事有小大，人心雖皆能合於天地之心，而古今不二，然所處風土、所接事物不同，自然所感不同而各發其諷詠，一如大塊噫氣，此氣為一，而曲成萬物則眾。是以詳考諸詩人所以有感而諷詠者，可以明詩人之心——即詩人所以合於天地之心者，亦是格物致知之道。若觀全書著作體例，《詩地理考》、《六經天文編》皆廣引古今遺文古事，較之《詩考》僅輯三家《詩》舊說，雖俱是東萊著書之法，然前者於搜羅文獻用力更為深廣；復《詩考》之輯三家《詩》舊說，僅於全書之末述四家《詩》之異同而已，《詩地理考》、《六經天文編》則已於各條目之下總備舊說以後，又兼以己意辨證，如《詩地理考》「自北而南」條：

孔氏曰：「《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從岐周被江漢之域。<sup>35</sup>

此深寧就〈詩序〉釋二南之南意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句，<sup>36</sup>參孔穎達疏鄭玄〈詩譜〉：「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sup>37</sup>句所引《尚書·西伯戡黎》注以辨證之。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據《尚書·西伯戡黎》注時當屬雍州，至於時所兼梁、荊兩州，則當屬鄭玄〈詩譜〉所謂「江、漢、汝旁之諸侯」，故深寧推知所謂「自北而南」者，乃自岐周至江漢之域。又若《詩地理考》「周公出居東都」條：

<sup>34</sup> [宋]王應麟著：《詩地理考》，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6月]，總75，經部69，頁635。

<sup>35</sup> 《詩地理考》，頁638。

<sup>36</sup> 《毛詩正義》，頁23。

<sup>37</sup> 《毛詩正義》，頁12。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sup>38</sup>

此深寧就鄭玄〈詩譜〉：「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句，<sup>39</sup>引《尚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句，<sup>40</sup>交相參照以辨證之。〈金縢〉既云「居東」，不言「出居」、「東都」，則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是以深寧以為鄭玄曰「出居東都」不妥，當云「居國之東」。又若《六經天文編·詩》「七月流火」條：

《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以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西流矣。」曹氏曰：「季夏昏正在於南方，暑已極矣，過是而流，流則暑退，故七月流火也。至九月流盡而伏於戌，寒氣始勝。」王氏曰：「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則四月正陽也，秀萼言月，何也？秀萼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胡氏曰：「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至未然後得其中，至於申則流，至於戌則伏。《傳》言火見於辰，又以大火為大辰，又以日月星為三辰，豈非日月星辰至於辰而畢見故邪！」《詩》言「定之方中」，《左傳》言「火星中而寒暑退」，及〈月令〉所紀「昏旦中星」，非他取也，取其中於未耳。《詩》言「七月流火」，豈非至申則流歟！《傳》言「火伏於戌」，豈非至戌而伏歟！餘星皆類此，然〈堯典〉時取其見於午者，何哉？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答陽為義也。<sup>41</sup>

此深寧就《豳風·七月》「七月流火」句詳考之，先引《左傳》文及服注，以證「火」當為心宿，及心宿至七月運行至西以釋「流」字。次以朱氏、曹氏之論以證心宿自季夏至九月運行軌跡乃由南至西，而此運行軌跡又象徵陰陽二氣之消息，心宿七月在申位是「暑已極矣」，至九月伏於戌位「寒氣始勝」。續以王氏之論導入卦氣學以論陰陽消息，進而詳解《豳風·七月》全章詩句，謹案七月辟〈否〉䷋、九月辟〈剝〉

䷖，俱處陰消；一月辟〈復〉䷗、二月辟〈臨〉䷒，俱處陽息，是以曰「七月」、「九月」者因陰消故，曰「一之日」、「二之日」者因陽息故，而九月戌位一陽將剝盡，進而十月辟〈坤〉䷁純陰用事，故曰「寒氣始勝」，又謹案四月辟〈乾〉䷀，當陽極陰萌之交，是以《豳風·七月》曰「四月秀萼」。更以胡氏之論證日月星辰一切天體運行，皆由東而南而西，所不同者遲速而已，一如日出東方、正午而南、仄而落

<sup>38</sup> 《詩地理考》，頁 720。

<sup>39</sup> 《毛詩正義》，頁 565。

<sup>40</sup> [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頁 188。

<sup>41</sup> [宋]王應麟著：《六經天文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4—55。

西，而心宿亦出於辰、亢於未、流於申、伏於戌。以上深寧總羅文獻，明析天體運行實際情況以證《豳風·七月》之不誣，又持之以證諸經傳所述「中」皆為正南未位，復亢極而仄之義理可由天體推致人事，故《豳風·七月》、《月令》所述、《左傳·昭公三年》張趯持以論晉平公，三者所秉義理俱一，而深寧總羅文獻、格天地萬物，以致知義理也。又若《六經天文編·詩》「雲漢」條：

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埤雅》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仰昊天，有嘒其星」，言早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下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早暘而熱，則小星森布如碁。星陽之精也，盛陽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sup>42</sup>

此深寧就《大雅·雲漢》之「雲漢」二字，輯《物理論》、《埤雅》，又參以《大雅·雲漢》篇文以辨證之，案「雲漢」於今當為大氣現象，古所謂天文除星象外，尚包含大氣現象，蓋星象、大氣現象俱出於天，即《繫辭上》所謂「在天成象」<sup>43</sup>也。先明「雲」、「漢」之本質，後持之以證《詩》旨，即格天地萬物，以致知天地之心也。

深寧於《詩地理考》、《六經天文編》所搜羅文獻之來源，遠廣於《詩考》，而於搜羅文獻之後，進一步根據文獻進行辯證，格萬物以致知天地之心，此又超於《詩考》之上。顯見深寧作《詩考》乃初搜文獻，為其底蘊，至《詩地理考》、《六經天文編》方才據其底蘊以行格物致知之事，非徒務為博聞強記，乃有次第地建立其《詩經》學。

### （三）《困學紀聞·詩》

《困學紀聞》為深寧晚年碎金所萃，全書以筆記形式，分述其《易》、《書》、《詩》、《禮》、《春秋》、天文、地理、史、詩、文等學。謹案《困學紀聞·詩》諸條目排列方式，前依《詩》文之序，分別列《詩》文之考據，後為其治《詩》心得，結構緊實。考據之事，殆深寧已行之一生，而總論治《詩》心得，僅能多見於此，故或可於此窺其《詩經》學體系，其曰：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癩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誠不可掩也；「鳶飛戾

<sup>42</sup> 《六經天文編》，頁 59。

<sup>43</sup> 《周易正義》，頁 143。

天，魚躍於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鱸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繁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急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萇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虺」，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於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sup>44</sup>

至此可證知深寧論其治《詩》方法在於格物，廣泛舉例以證《詩》中所述俱可以格，而自《詩》所格而得者同於《易》，故引〈繫辭上〉「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易》、《詩》之間又可以互相參證：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於〈關雎〉，雅始於〈大明〉而〈思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sup>45</sup>

然格物目的在於致知，格《詩》之物以致知如何可能？所致之知又為何？深寧論曰：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蒸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sup>46</sup>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sup>47</sup>

前文以「格物致知」為治《詩》之法，此又以孟子「以意逆志」為誦《詩》之法，更明言學《詩》必自孟子始，似前後文相扞格，然孟子論讀《詩》非僅「以意逆志」之法，亦言「知人論世」，<sup>48</sup>知其人、論其世，是對詩人所處情境有精確之了解，方能「以意逆志」，可以知詩人之所感，而藉窮究《詩》中名物以知人、論世，又豈非「格物致知」？則格《詩》所述之物，知詩人其人、論詩人其世，進而知詩人之所感於天地之心——天地之理者，由「格物致知」乃至「以意逆志」，是深寧《詩經》學之全貌，而對詩人所處情境之了解、以及感詩人之所感，皆不出於任一讀者之主觀經驗，此主觀經驗又超於語言文字之外，故深寧又專就此主觀，帙荀、程、董、

<sup>44</sup> 《困學紀聞》，頁 207—208。

<sup>45</sup> 《困學紀聞》，頁 211。

<sup>46</sup> 《困學紀聞》，頁 208。

<sup>47</sup> 《困學紀聞》，頁 210。

<sup>48</sup> 謹案《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頁 145。〕是孟子亟言讀文學作品，需對作者所處情境有充分之掌握。

孟之說為一條目，以荀子「善為《詩》者不說」點明讀者之主觀，程子「優遊玩味，吟哦上下」闡述讀者主觀之運作方式，末以董仲舒「《詩》無達詁」、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說明主觀經驗超於語言文字之外，故不可以言述。然讀者欲於獲取主觀經驗，仍離不開文字語言，故格物、知人論世僅是方法，僅具有工具性，所致之知、所逆之志方是目的、成果。

總本節所述，深寧《詩經》學之建構過程有跡可循：《詩考》僅總羅文獻，輯《詩》三家之軼而已，是呂氏著書之法；《詩地理考》、《六經天文編》更廣搜古今之說，間以辨證，不僅更為擴充呂氏著書之法，又加以朱熹格物致知之學；至《困學紀聞》正式提出格物致知乃至於以意逆志之體系，則是以呂氏著書之法為基礎以格物致知，進而證象山之本心。是知深寧融通呂、朱、陸三家之學，非是驟然為之，乃以一生精力循序漸進，而所以訂定此序者，或出於深寧鑑於呂、朱、陸三家之學優劣故：呂學總羅文獻，著眼於下達功夫；陸學著眼於本體豁顯發明，專務於上達境界，較未著眼於現象界；朱學著眼於格現象界之萬物以求上達，總羅文獻之方不及呂學、其上達難以致一又不及陸學，但能辯證以求理又勝於呂學、陸學。是以先以呂學下達功夫為基礎，進而持朱學以辨證，而終達於陸學之致一，顯然據「下學而上達」為本而訂定其為學之序，此序忠實地反映於其《詩經》學上。

#### 四、結語

本研究試析王應麟之《詩經》學，知王應麟乃兼綜呂、朱、陸三家，更復向上為其《詩經》學。其兼綜三家，以呂學下達功夫為基礎，進而持朱學格物以辨證，而終達於陸學之致一，非是驟然未思，先是總核彼此優劣，截長補短，後以一生精力循序漸進。復參宋代從事經學者之於漢唐舊注，多罪其因襲固陋、抱殘守缺，故發以己意、堅持己見，乃至末流偏囿一師、一家、一派，交相辯駁，僅求最勝義，務求驅除異己，即便深寧已於宋末元初斟酌諸家得失，而得和齊向上之方，然觀元明間朱、陸末學之交相攻訐，又嘗不是因襲固陋、抱殘守缺？則宋儒與其所病之漢儒又有何異？至於清代學者論深寧之學，則又多僅止於推崇深寧之考據，而鮮見其所以為考據乃為求致一，多是困於下學而未及至上達，以致未深究其學之精微處。

深寧能於眾聲喧嘩中客觀分析當代諸家長短，於經、史、子、集乃至漢唐舊注等一切諸學又無成見，故其學廣大精微兼而有之，在於其《詩經》學，則學者罕能罪其一辭，較之元、明交詬不休、清之困於下學者，實為超然。雖其未能樹立旗幟，廣聚後學，然自我標榜以成家派，畫地自限，要非深寧之所願也，理萬殊而一本，學苟偏於萬殊，謂人我古今相別，則復於一本終無期矣，深寧之《詩經》學得超然於古今諸家之上，或其已明一本萬殊之至理矣。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依作者生年先後排序）

- 〔東周〕孟軻著：《孟子》（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
-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南朝宋〕范曄撰、〔唐〕章懷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宋〕王安石著：《王安石全集》（台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10月）。
- 〔宋〕朱熹著：《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合編，2002年12月）。
- 〔宋〕呂祖謙撰：《呂氏家塾讀詩記》，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6月），總73，經部67。
- 〔宋〕陸九淵著、傅子雲編次，〔明〕傅文兆校閱：《象山先生全集》，收入《四庫存目叢書》（台北：莊嚴文化，1997年6月），集部19。
- 〔宋〕王應麟著：《詩考》，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6月），總75，經部69。
- 〔宋〕王應麟著：《六經天文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王應麟著、〔清〕何焯、閻若璩評註：《困學紀聞》，收入〔清〕紀昀等編：〔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6月），總854，子部166。
- 〔明〕黃宗羲撰、〔清〕全祖望續修、〔清〕王梓材校補：《宋元學案》（台北：河洛出版社，1976年3月）。

### （二）今著：（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

- 何澤恆著：《王應麟之經史學》（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1981年）。
- 洪湛侯著：《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
- 黃忠慎著：《宋代《詩經》學探析——以歐陽修、蘇轍等六家為中心的考察》（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年9月）。
- 劉毓慶著：《歷代詩經著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月）。

### （三）期刊論文：

胡瀚平、閻耀棕

張祝平：〈王應麟《詩考》版本源流釐正〉，《南通師專學報》，1994 年第 2 期，頁 13—17。

蔣秋華：〈王應麟的《詩經》學〉，《開封大學學報》，1997 年第 1 期，頁 114—117。